

· 中西文化 ·

主持人語：

1582 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1715 年,教宗克萊孟十一世頒布《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通諭,禁止祭祖祀孔;中間則是中西方哲學對話的輝煌時期。傳教士們以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為基礎,與儒家士大夫研讀和交流中西經典,進行翻譯工作,學習和參考彼此的核心概念,並試圖接納對方的思想資源,以重構和豐富自己的傳統。本期“中西文化”欄目聚焦於“明末清初中西跨哲學對話:倫理道德的實踐性問題”,呈現三個不同階段的案例。第一篇文章論述了明清時期西方天使論的引入,通過揭示三種不同的立場,探討中西鬼神思想的交流與互動;後兩篇文章的論述則基於較少人利用的外文資料。

孫赫以中國天主教徒、反教士人以及佛教僧侶對西方天使觀的接受與反應為例,系統論述了天主教天使與中國傳統鬼神思想之間的交互。作為獨立於人類世界的外在性力量,西方天使與中國鬼神在引導個人道德實踐方面具有共通性。因此,大部分中國天主教徒分別將天使作為“以耶補儒”或“以耶超儒”的思想資源,對其進行重新闡釋與接受。然而,一些反教學者和佛教僧侶忽略了這一共通性,基於固守夷夏之別的立場,反對引入天主教的天使觀。但這種絕對化、排他性的觀念,不僅是對宗教傳統精神的誤解,也提醒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和評估中國傳統的內涵與界定。

意大利人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和比利時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批評“明明德”雖然充滿理性精神,但缺乏實踐性。不過,王格的文章表明,一些傳教士更傾向於承認儒家倫理道德的實踐性維度,如比利時耶穌會士衛方濟(François Noël)在其著作 *Philosophia Sinica* (《中國哲學》,1711 年)中,通過程朱理學將“明明德”與心性論連結起來,並借用亞里士多德與經院哲學中理智與意志的關係,重構了“至善”與具體的善之間的關係,從而為倫理實踐性提供了有效的形而上基礎。

陳萍的文章梳理了一位從未到過中國的法國思想家貝尼耶(François Bernier)。正是通過閱讀殷鐸澤和柏應理對《大學》、《中庸》、《論語》的譯注(即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國哲學家孔夫子》),貝尼耶認為中國哲學的重點不在於追求個人幸福,而在於實踐人民的幸福。這樣,他就把儒家思想重構為一種保障國家財富、維護社會安定的政治思想。此外,貝尼耶也對“孝”提出了新的理解,將兒子和臣民的絕對義務轉移到父親和君王身上,試圖限制路易十四的絕對權力。

可以看出,三篇文章都針對同樣的問題,即倫理道德的實踐性,明清時期的中西士人也願意借助其他思想資源來解決自身社會文化中的具體問題。不過,因為處境的不同,他們的解讀也存在歧異。對於接受了西方天使觀念的中國士人而言,基督宗教有效地補充了儒家傳統在此類超驗問題上的缺失。相反,貝尼耶刻意將政治與宗教區分開來,並強調儒家的世俗性可以作為重建西方政治學的典範。在衛方濟那裡則可以看到,他發展了一種基於“明明德”的有效行動倫理學。

主持人簡介：

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法國人,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西學東漸、中學西傳、中西哲學比較等。主要著述有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Liang Shuming*、*The Jesuit Reading of Confucius: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Lunyu (1687) Published in the West*、《從邂逅到相識: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主編《中國哲學家孔夫子》,合作注釋、校勘《天主實義今注》、《童幼教育今注》、《修身西學今注》、《聖朝佐闡》等,主編《西學東漸研究》(已出至第十四輯)。